

## 在砧板上寫評論

--到紐約，訪問夏志清教授 廖玉蕙 2001.09.16.

在紐約曼哈頓的寓所，我們訪問了夏志清教授。短短幾個鐘頭內，我們充分見識了夏教授頑童般的性情和連珠砲式的語言風格。中英文夾雜、講話快、思想跳躍、表情豐富、熱情洋溢，場面的熱鬧一刻也不停歇。一會兒讓夫人王洞女士幫忙倒飲料，一會兒得意地站起來展示他新買的書籍；一會兒關冷氣、一會兒開窗戶；講到精彩處，忽然話鋒一轉，無端反問起我們的兒女；要不然就毫無預警地提起某一個台灣的故交。我們吃力地追隨他的思考東奔西竄，幾度被攪得七葷八素，差點兒失去了原先的訪談方向。那夜，在曼哈頓的一家中國餐館內，為了付帳，英勇的外子還奮力地和他們夫妻二人演出全武行，終究敗下陣來。他們人多勢眾，餐館的老闆、伙計都不買我們的帳，死心塌地的跟他們夫妻站同一邊兒，可見夏先生在紐約勢力之一斑。

離開他們的寓所前，赫然發現，為了讓書桌墊高些，桌面上，竟然放了一塊又厚又重的木頭砧板！我們不禁瞿然大驚！夏先生的評論如此犀利，原來是在砧板上寫出來的，難怪用筆如刀、削「文」如泥！

廖：一九七六年您寫了篇<勸學篇>，不客氣地反駁顏元叔教授<印象主義的復辟>一文、一九七七年三月又寫了<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文筆犀利地對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有強烈的批評，銳氣十足。在劉紹銘近日在人間副刊寫的<夏志清傳奇>裡也提到一九六四年在印第安那大學召開的第二屆東西比較文學會議時，您曾不客氣地劈頭便問康乃爾大學的漢學家 A.C.Scott「新作錯誤百出，怎麼搞的？」您敢於直言的勇氣，在傳統講究溫柔敦厚詩旨的中國文人裡，真是獨樹一幟！讓人佩服。如果在二十餘年後的今天，您仍然會如此不留情面嗎？您覺得這是做學問必然的風骨嗎？

夏：A.C.Scott 這個人不算是漢學家，他是英國人，專門弄戲劇、畫畫的，現代文學不大懂。1961年，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沒多久，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很重視，就在<星期書評> Page 中刊出書評，請了 A.C. Scott 評。但是，他不太懂，外行說外行話！雖然對我的書很重視，評文卻不得要領，尤其觀念左派，所以，我不太高興。外行人可以去做翻譯，但不能來評啊！本來想寫一封信給 New York Times，但有人勸我說擺在 Page 已經很好了，不必要再寫。所以，我就沒做。後來看到他，我就打他、罵他。其實，

我不是看不起他而生氣，只是這個本來就不是他的本行，他搞戲劇的嘛！對文學不了解。劉紹銘看到了，把它寫出來，我不是那麼兇的，我不會講那麼衝的話，我這個人對人是很溫柔的，尤其對女性，你看我不是一直都笑謎謎的嗎？只有我太太說我兇，是自己人才這樣嘛！

廖：是不是對人溫柔敦厚，可是做學問就得直言無諱？

夏：我想這樣也是。我這個人是這樣的，我是不打人的，都是人家先打我的，我用不著打人嘛！像顏元叔，是他先罵我的，因為他講“復辟”，好像張勳復辟一樣，這是一個壞字眼，我又不是軍閥！所以，我才會出來反駁。本來我是不研究人家學問的好壞的，我很忙的。但是，顏元叔曾送給我一套西洋批評史，我翻過以後，發現理論雖然都是差不多的，可是，裡面有些翻譯不對，這就證明了他的學問是不夠的，人也不夠謙虛。

廖：我們知道您雖然是耶魯的優等生，但是，在洋人的學院裡要佔一席之地，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您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很用功的，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您是怎麼做到的？

夏：今年我很得意，以前我只要寫文章，血壓就高起來，現在還不錯，寫了文章，血壓不高。最近剛寫了一篇大文章，就叫〈耶魯三年半〉，有提到這個問題。章緣也寫了一篇文章叫〈人生八十才開始〉，就是在談我；劉紹銘也剛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了篇〈夏志清傳奇〉；上禮拜，高克毅寫一篇文章講我哥哥的；昨天，王德威打電話給我，說白先勇寫我的文章也登出來了。我很高興。話說回來，我當年在美國唸書的時候，那時候環境不比現在好，現在是只要有本事就出頭。那時候，外國人拿到博士學位，都回國去教授英美文學，不像現在，機會較多。那時（1951），我在耶魯拿到 PHD，我能到耶魯去，我的老師也都幫了大忙。William Empson(1906-1984), Cleanth Brooks(1906-1994), 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 三位不朽的人一起推薦我到耶魯去。

廖：您在批評司馬長風的文章中曾說：「任何作家自己對人生毫無感受，對人生

沒有獨特看法，是不值得重視的。」您在從事評論工作時，是不是也以「獨特看法」為評鑑的重要準則？

夏：我不是故意要獨特，我很多文章都不寫的，普普通通的就不要寫嘛！司馬長風靠寫作維生，文章很多。文學史寫，散文也寫，跟中國許多文人的壞毛病一樣，寫到哪個人捧，實在不用這樣的，沒意思！人家講什麼好，他就說什麼好，別的書上都講過，表示他沒看出東西來。他關心作家，我也關心呀！可是，他的評論和我的就不一樣。何況，唸書唸多少，跟你什麼時候看也有關係。司馬長風大概就跟一般人一樣，中學時期看太多書，覺得很多人都很偉大，因為從小就崇拜以後，長大後，腦筋就變不過來，書看得再多都沒用！這一點上，我當然是佔些便宜的，我年輕的時候，中國近代小說沒看多少，念 Ph.D. 後，再看他們的東西，就不會盲目崇拜，我的評論就寫得跟他們不一樣，這是真功夫。

廖：這話好像有一點道理喔！

夏：當然有道理！就像假設從小就一直看瓊瑤的書，可能以後就很難跳脫得出來，境界上就差很多，這個觀念很重要。小孩子可以從小給他們看童話，自己在家裡看也懂得。女孩子就是不要給她看愛情小說，人生沒有那麼 ideal 嘛！男人壞的還是比較多嘛！當然！except me and 蔡（指著同行採訪的蔡先生），最好還是不要上當。早點把英文學好，西洋翻譯的書也可以看看，白先勇、王文興的文章都很可以看，現在台灣的文學程度都很高的。

廖：您曾經說：「文學批評不可能是真正科學化的。」認為有些統計式的研究可用科學法進行，但對某首詩、某詩人的鑑賞評斷，還得憑個別批評家自己的看法，是無法科學化的。這是不是說對文學的鑑賞是見仁見智的？那麼，又如何來判定美醜？

夏：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很年輕的時候，當然程度不夠好，那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到了相當的年齡，譬如高中、大學了，你還是覺得莎士比亞不好、杜甫也不好，那麼，一定是 hav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你有問題！你就要懂

得謙虛，這樣的程度一定要改過來。第一個你必須要喜歡莎士比亞，如果不喜歡莎士比亞的話，對英文就不會感興趣。也許我可以這樣說，就像不喜歡莫札特、貝多芬，從小不聽古典音樂，只聽 Rock、Beatles，就沒長進了。經典作品是一定要看的，如果你不喜歡看，你的父母是要負責任的。父母 must make the child like better things，想辦法讓他的孩子對向上的事有興趣，趣味才高，這樣才有救。

廖：那麼，像現在台灣有人在推行幼兒讀經，讓孩子很小就去讀經，其實，他們都看不大懂、聽不大懂，只是背誦，您覺得好嗎？

夏：這不好！我覺得孩子教育可能從音樂開頭會最好。現在畫這樣壞、音樂這樣壞，真是大悲劇！西洋這五十年來變化很多，黑人的 Rap 饒舌歌、罵人音樂這樣多，我覺得這是父母的責任。強迫讀經最不好了，硬要背，我們小時候背書是歡喜的，現在不流行了。這兩年，美國的教育有所謂的拼字比賽，成績最好的往往是出自家庭教育成功的家庭，目前，很多家庭都不讓孩子去學校上課的。你到高中去，看到每人穿的衣服都一樣、都很貴，小女孩穿性感衣服，父母也不管，像什麼樣！中國人和猶太人的家庭就這一點好，不管再怎麼窮，一樣要向上。

廖：1978 年時，您在文章中強調您小學三年級時讀完整部《三國演義》，而且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念完初中竟還沒讀過《三國》，則就算再用功，教育也是欠缺的。您現在還是這麼認為嗎？您所持的理由可以跟年輕的讀者分享嗎？

夏：《三國演義》我覺得是應該讀的，因為這個是歷史信實度，reliable history，壞人也有、好人也有。女人講少一點，講國家大事、男人義氣，沒有 exaggeration(誇大)。我現在還是覺得它最好。雖然裡頭殘酷的事也不是沒有，但是，小學時看不出來，只是覺得熱鬧。衝突是有的，經過一番努力，一下子又灰飛煙滅。曹操起來了，一下子又是司馬家起來，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三國演義》的好就在：一是簡單文言，不用看字典就可以唸下

去；二是可以看人家打仗怎麼打，非常好，因為這是 real。

廖：所以你覺得《紅樓夢》不看沒關係，一定要看《三國演義》？

夏：《紅樓夢》也要看，年紀大一點才看，不用太早。我看《紅樓夢》是大學一年級時，太早不好。而且，我看 intelligent 的程度，賈寶玉非常好嘛！中國的好人不多嘛！它講女性都非常之真。林黛玉很好，薛寶釵也很好，人家都罵薛寶釵，其實各人做各人的人嘛！

廖：在台灣許多學生都為學英文感到很大的困擾，我們知道您從年輕時在英文上便下了許多功夫，而且有很好的成就。可不可以為我們談談學英文的要領？

夏：要訣就是你每個生字都得記住。我覺得我哥哥比較好，我是沒有他好的。我中學念的都是野雞中學，他上的蘇州中學、上海中學都是好學校。所以，他的國學根柢都比我好。他駢文唸過，詩賦也唸過，他讀的東西廣，學校好、老師好。而且，同學都聰明的話，你也會進步多些的。

廖：這麼說，現在的家長為孩子選學區，還真是有道理了？

夏：學校名譽好，學生都向上。中學時，我家庭搬來搬去，弄得一塌糊塗！如果不是這樣，中文、英文都應該會更好些。

廖：可是，後來怎麼變這麼好呢？

夏：靠自己努力。我到復旦大學去，我英文一向就好，不過，想不到我能講得那麼好！這種東西還是要有興致的，沒有興致是不行的，沒辦法勉強的，我的興趣就是念文學。

廖：也就是說你其實是順著興趣走，因此，絕對不能去逼小孩子做他沒興趣的事情？

夏：最不好就是這樣。比方說，兒子要畫畫、聽音樂，偏偏不讓他去走這條路，這都是害人的！談戀愛，非要把他 put him away，這都是害人精。

廖：從文章中看出您閱讀的廣博深邃，可不可以為我們談談您的讀書經驗？並為我們傳授秘訣。

夏：我是到了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唸書一定是有目的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西洋文學的經典都看完。我覺得小時候瞎看是沒道理的，最偉大、最好的要先看，看了就會有根柢，根柢好，學習就快，中文、英文都一樣。中國人其實還是要多學一些外國東西，多念一點洋文，德文也好、法文也行，如果英文再好，那就不得了了！這不難的。不過唸書這件事，真的要有興趣，有興趣的話，會覺得越難越好。

廖：您做學問有受到哥哥夏濟安的影響嗎？

夏：影響並不大。我們差四、五歲，而且我們小時候不常在一起，大學畢業後在一起也沒多久。不過，他的榜樣是有的。他是打天下的人，沒有他的話，我是出不來的。是他叫我到北大去的，如果我不是去北大，我早就完蛋、死掉了！

我哥哥本來是唸哲學的，哲學非常好；後來改唸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念的人很多，成績雖然一直也都很好，可惜沒拿到庚款獎學金。所以說，聰明的人不一定交運。我家裡這樣窮，我大學畢業後能到美國來讀書就是因為交運。當時，做了幾年事，賺了幾年錢，身邊只有五十元美金，請吃一頓飯都不夠！

廖：您在《雞窗集》序裡說：「每晚二三點鐘『雞窗』夜靜之時，我不在讀書，即在寫文章、打字，而且往往清晨六點鐘才入睡。」您現在還是維持這樣的習慣嗎？

夏：生病以後就沒有了。開頭的時候也沒有，反而是唸大學的時候，都是十二點到兩點，後來結婚以後就越來越晚了。我一向身體好，說起來生病真是冤枉！六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先是戒煙，接著食物改良，不大吃肥肉；第三開始運動。剛開始，體育館的跑道一圈都跑不到，兩圈、三圈、四圈，後來，中間只要休息幾分鐘，我可以跑上三十圈。八三年，我到大陸去，走路用飛的，像是仙人一樣，身體狀況好得一塌糊塗！九一年退休時，你看到的這個房子，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弄好的，全部的書上架，搬上搬下的。九二年夏天，

運動過度，晚上，心臟「啣」地一轉，就到醫院去，從此以後就倒楣了。以前，我從不看 TV，News 也不看，覺得浪費時間。一回，到印第安那朋友家，吃過晚飯，大家都不講話，坐到電視機前看節目，我覺得滑稽死了！生病以後，我也變成這樣，吃晚飯時看 TV。唉！時間浪費起來真快呀！

廖：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在他導演的《早安》片中，似乎說過「這個社會有時候有一點浪費也是好的」，夏先生顯然不必為看一點 TV 新聞就如此自責！

夏：也是，身體不好時，看書很累，只好看看 TV。身體好了，就又不看了。現在年輕的教授都看的，美國第二代都不如第一代，我們那時候都用用功來愛國，現在愛國都是假的，其實都只是愛自己，浪費時間。像叫我去 vacation，到巴黎沒什麼好的，看書還不是一樣。譬如到館子去吃一頓好飯，心裡也是很舒服是一樣的。我就是喜歡看書，系裡送我一件粉紅運動衫，我不歡喜，本來可以退錢，昨天，我心血來潮去「退書」，買了兩本書之外，又退了我九塊錢。一件運動衫，換兩本好書，很划得來的。

廖：您出版的《新文學的傳統》一書裡用了幾近六十頁的篇幅選評二報小說獎作品，看了真讓人感動。近年來我也參加無數文學獎評審工作，我可以老實招認，幾乎可以說再找不到像您這樣認真的評審了。如此詳實中肯的批評與建議，對初學寫作或熱中寫作的年輕朋友真是太寶貴了！您一向做事都如此全力以赴嗎？

夏：那時候，我認真嘛！不過那篇文章寫完，因為罵得太兇，中國、聯合兩大報從此不敢找我去評審。我把兩個頭獎—聯合報〈老榕〉、時報〈進香〉都罵得一塌糊塗！那時候，我的 energy 豐富。看了書不忘記，現在我看書看到一半會忘記。不過，我這個人做事就是這樣子，永遠做最好的。好像連講笑話也是，make you happy！不過，你說的那篇〈二報小說獎作品選評〉寫得是真不錯的。當時，我辯得厲害，沒有人敢再請我去了，我再說人家要不高興了。外面的人都說我神氣，其實我只是 Do my best。

廖：在海外，您有沒有參加當地的一些文學活動？

夏：沒有，就是學術活動而已。美國的文學活動我參加的很少，因為我不是作家嘛！像白先勇可以參加，劉紹銘就沒資格，王德威也沒資格，我們都是參加學術活動。

廖：最近，您好像得了華文寫作協會的一個獎？

夏：台灣的一個獎。是這樣的，他們開會總要做一點事情嘛！各地方的人都來了，做什麼好呢？馬克任就給我們三個老人（夏志清、琦君和王鼎鈞）外加一個中年人（鄭愁予）頒個獎！很好啊！

廖：您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慧眼獨具地將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的張愛玲引進現代中國文學的廟堂；更對沈從文另眼相看，特闢篇幅詳介，這都可以看出您史見的卓越出群。在四十年後的今天，您願意再為我們推薦幾位當代的重要作家嗎？

夏：我現在寫文章都是幫人家寫序而已，別的我都沒看，沒辦法全部看，太吃力了。你不看全部，寫出來的文章，力量就不夠，沒辦法評，所以，就只有寫個序了。評審倒還可以做的，between 四十篇的作品，可以看完。

廖：那麼年紀輕的作者中，您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

夏：沒有看全，到黃凡那個時代就完全停止。以前，十個作家一起看，看起來快，現在不行了，要我的命！評論的東西，我越來越不做了。寫當然還是可以寫啦！只是，講起話來連自己都不 sure，沒意思嘛！現在就是王德威一個人了，他看得多。王德威可惜就是不大罵人。哈！哈！

廖：王德威可能只介紹他喜歡的，所以他不用罵人？

夏：這個一定要罵罵的，就是喜歡也有不好的地方嘛！這個地方他很吃虧的，他是四平八穩地講起文章來。不過，人家也不敢挑戰他，所以，他很寂寞，very lonely，人家都打不過他，都跟他走。

廖：你長期投入文學評論工作，是教書和研究的需要呢？還是完全只是興趣使然？

夏：當然有一部份是 professor 的責任感，教書是有必要性的。說起來，其實兩



個都有，唸書、看文學雜誌是興趣；人家找你寫文章，是一種 challenge，挑戰。每寫一篇文章，都是一個 challenge。你所講的新話沒人講過，提供新資料嘛！

廖：最後，我們談點輕鬆的，你目前的生活狀況仍舊是以閱讀和研究為生活重心嗎？

夏：現在是這樣的，我的《中國古籍小說》中文版在台灣出來以後，可能接著將張愛玲的書信集印出來；同時，我也把我的英文文章結集在一起，王德威幫我找人打了字了。另外，再把我哥哥夏濟安給我的信出一本書。還有一些文章，我一直都沒有整理起來，將來可能再出兩本書，一本散文集，一本評論，講梁實秋的、琦君 等等的，都還沒有結集出書嘛！